

# 理论动态302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1981年9月20日

## 简论鲁迅的历史观

——纪念鲁迅诞生百周年

陶 白

鲁迅不但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凡是称得上是真正的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不是重视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本国史的研究，没有不是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而且又都有他们的一定的历史观的。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历史和大地这个母亲一样，正是养育思想家所必备的物质和精神的食粮。

当举国筹备纪念鲁迅诞生百周年的前夕，正是我们认真地学习中共六中全会文件的时候。《决议》和耀邦同志“七一”讲话中，都提到要学习中外历史。而适在此时，又第一次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在这个报告的一开头，就是讲的关于

中国历史的发展，从古代史讲到近代史，进而讲到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启示我们，研究鲁迅的历史观，对现实、对未来，我想都不失为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鲁迅虽然没有写过中国史的专著，也不是史学专家，但是从他的全部著作中，不难看出，他不但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特别是本国的历史知识，从先秦直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而且有他自己的历史观，也就是说，对社会历史的存在与发展，有他自己的独到的发前人未发的见解。应该说，这也是鲁迅留给我们的全部宝贵遗产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为此，我想就鲁迅的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作一些简略的叙述，还谈不上什么研究。

鲁迅不仅重视自己对历史的研究，而且也是积极提倡学习历史的老师。他曾说过：无论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同时他又一直深慨于还没有一部象样的中国史，这在一九三二年致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说得最明白：“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室无赖儿郎，都须褫其华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明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事实是其中有些史，至今也还未有人着手，或者还没有专著。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读史为了用史；其二，历史要真实，这一点，他是反复言之的。这对旧史学家来说，固不应苛求，但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史学家来说，就应当提出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力求还历史的真面目，既不容随意歪曲史实，更不容随意篡改史实，再使青

年“莫明其妙”，至于对有些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可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善意的探讨。

鲁迅把旧中国的史籍，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史；一类是野史和杂说。所谓正史，如“官修”而又加以“钦定”的二十四史。由于正史要摆“史架子”，所以废话太多，里面也不敢说什么。其结果势必歪曲历史的真实性。而野史和杂说就不同了，因为它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内容就更容易了然。虽然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不象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所以鲁迅不仅提倡学习正史，同时也提倡学习野史和杂说。他对正史与野史及杂说的看法是有分析的。他既没有一笔抹杀正史中有价值的部分，也没有掩饰野史及杂说中所存在的缺陷，因而两者不可偏废。问题决定于读史者有没有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有没有识别历史真伪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如上所述，读史为了用史，所谓用史，又主要表现在什么问题上面呢？就在于通过我们的祖先所已经走过的道路，推知现实的和未来的应该走的道路。鲁迅一再说：“然而翻翻过去的血的流血账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以往的经历，也有一定的效用。”这里所说的推知，决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更不是守株待兔，而是要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立志于对社会的改革，才能对现实与未来产生新的希望。他说：“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说得最深刻的是：“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属于存在

的，有存在，便有希望，便有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由此可知，鲁迅之所以提倡读史，实在是为了祖国的命运，丝毫没有把研究历史当作可以逃避残酷的现实的蜗牛庐。

那末，旧中国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部历史呢？在鲁迅看来是压迫与被压迫，奴隶与奴隶主进行斗争的一部流血史。

还在一九二五年时，他对旧中国的历史曾说过：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种循环，也就是“先王”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在一九二六年，他说：“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

在一九二七年，他说，我曾说过：中国历史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

到了一九三四年，就说得更彻底了，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据此，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粗浅的结论，如果鲁迅不熟悉旧中国的历史，即一方面不熟悉历代那些腐败的统治阶级的荒淫与无耻，特别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从袁世凯、军阀、直到蒋介石的荒淫与无耻；另一方面不熟悉被统治阶级的苦难生活，而被统治阶级又正是祖国未来命运的脊梁，所谓“民魂”，

是得不出这样前人所没有道过的历史的断语的。而他的一生，所以是战斗的一生，就在于不遗余力地挞伐那些吃人的、毁坏世界的奴隶主，为的是一个新的未来。

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的商、周算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这一部漫长的、为后代在各方面留下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遗产的文明古国史，到底是谁创造的呢？是勇敢的、勤劳人民创造的，还是上帝特殊加以恩赐的所谓天才创造的？鲁迅是肯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天才创造的，而且还尖锐地批判了所谓天才史观。

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曾发表过不少议论，简述之有：“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很显然，所说几千百万的活人，愚人，无名氏，是勇敢的、勤劳的人民，决不是什么天才。而他们所创造的，正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才能生存，才有可能从事政治、文艺等各方面的活动，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与此同时，鲁迅还歌颂人民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在《题未定·九》一文中，他在引用谢国桢所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关于明阉魏忠贤使缇骑逮捕周顺昌一事（即《古文观止》中的《五人墓碑记》）后说：“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在引用“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消息后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

被愚弄诬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在引用明张岱在《越绝诗小序》中一段话后，得出一个结论：“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其意，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火种。只要有人民在，历史的火种是谁也扑灭不了的。

与此同时，鲁迅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在历代统治阶级中，也有和人民在一起修补世界的开明的人物在。他曾一再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历史（指二十四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对这个问题，他还说过：“……中国的史家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毫无问题，对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评价，要进行阶级分析，但决不能由于强调阶级观点，就抛开历史主义，忽视其他条件，就可以随意褒贬，随意上纲上线，这是违反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数以百计（约数，没有统计过）。这里仅举一个对乾隆的评价的例子，当他谈到清代文字狱的时候，他说：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才。鲁迅对乾隆的评价，也仅止于此，没有说更多话。能说鲁迅没有阶级观点吗？但鲁迅这段话，是写于一九三四年的，此时鲁迅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如果说他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吓人的教条主义。

另一方面，还在一九二四年，他就批判过由来已久的所谓天才史观了。他曾说过：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样民众，就没有天才，如同没有好土，便没有乔木与好花。如此说来，如果真有天才，那末，天才的母亲就是民众，离开了民众，不仅没有天才，即使有，也活不长，也迟早要被民众抛弃掉的。

人们常常把最有威权的人看作是天才的，那末，威权又是什么呢？照鲁迅看来，不论是社会学或者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正因为有了弓箭，才有威权。所以鲁迅曾慨乎言之曰：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先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人民的血所以不值钱，就在于权力者有弓箭。但是一旦弓箭成为人民所有，权力者就没有可以依恃的了，权力者也就随着弓箭的消失而消失，血的历史也就可能结束了，这正是鲁迅所希望的。

人们也常常把古之秀才一流的人物，列入天才之列的。不是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说法吗？仿佛秀才是无所不晓的。鲁迅说：“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的头脑和秀才的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这里所说的秀才，也许就是前人所说的书蠹，或者是后来所说的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吧！

鲁迅是一贯相信历史是发展的，决不会倒退。即使他处于围攻中，处于危域中，这一信念，他从未动摇过，从未悲观过，自始至终同阻碍历史发展的各种邪恶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本色。

还在一九二五年，他曾大声疾呼地要同一切旧事物进行宣战。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还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他。这是何等气魄。

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在《黄花节的杂感》一文中，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得出这样一个异常深刻的结论：“革命无止境，倘使世界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成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我认为这段话是极富有现实意义的，按照社会发展史的规律来说，即使是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缺陷，有矛盾，有斗争，还要继续前进。如果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止于至善”的社会，那末，历史的生命就要宣告结束，变成一个凝固的东西了。

历史是发展的，那末，决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依靠什么力量，才使历史得以发展、前进的。对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对鲁迅来说，是经过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反复的独立思考的过程的。直到一九三二年，他才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二心集：序言）这在鲁迅的思想发展中，无疑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虽然鲁迅在当时已经直接参加革命活动，已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但是，“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个概念的获得，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是经历了残酷的事实而获得的。所以根底也就特别深厚。这个事实，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他曾说过：“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动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答国际文学社问）

另一方面，来自“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的中国的事实。他在一九三三年致姚克的一封信中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学，《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所谓非“匪区”的事实，就是以血做游戏的国民党的统治的事实；而所谓“匪区”，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苏区。

这两方面的事实，使鲁迅确信，惟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将来。这个信念，在他一九三六年答托派的信中，是表达得更为明确坚定了。鲁迅一心追随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人引为自己的同志，绝不因党的事业遭受挫折而有一丝一毫的疑惑和动摇。

在这里，我以为特别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启示鲁迅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起斗争的主要是由于十月革命后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而不是书本上的教条。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实践高于理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从现存的事实开始的，即从研究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的。这

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解释得清楚。如果鲁迅脱离现实，脱离现实的斗争，读书最多，也决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谓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的、历史的事实。而理论是什么呢？“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毛泽东语）但是当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轻视对理论学习。而且从此以后，鲁迅更加大踏步地前进了，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了，他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一支铁笔，这支铁笔，是投枪、是匕首，在战斗中，真可谓所向披靡。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他在战斗中，曾抱着极其悲愤的心情，歌颂与悼念在阶级斗争中，已经战死的革命勇士。他很清楚，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是要付出巨量的血的代价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一九三三年，当他谈到酷刑时说：“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不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历史正是这样在无情的阶级斗争中前进的。

与此有关的有几篇文章，我以为特别值得后继者多看几遍的，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于深夜里》。在这几篇文章中，充分表达了鲁迅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感情的深沉和爱憎的分明。他说：“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不是青年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

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中挖一个小孔，自己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是鲁迅写的青年们为中国革命而流血的历史，也是鲁迅为自己写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史。

古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鲁迅是有其初，也是有其终的。他是在不断解剖自己，解剖世界的艰难的历程中，为“确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的这个理想，坚定不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到底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当他在快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历史时，即一九三六年，一如既往，没有忘记为推动历史发展，正在苦斗中的中国人民。“但我看他们（指穷人）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死》）“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非经宋元明三朝的压迫，杀戮和麻醉，不能到这田地。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日战争），而宋元明清之教养亦醒矣。”（立此存照“六”）这些，是他在临终前写的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已到了更为壮阔的历史时期了。

鲁迅的历史观，简述如上。（应该说，并没有包括他的历史观的全部内容）它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探索，敢于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同时要记住的，还有：

鲁迅的历史观，是用文学的、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又是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不发空论，其文短而精，又都有历史事实作为他的立论的根据的。所以读起来，能引人入胜，毫无枯燥乏味的感觉，没有一点八股气。这是一个与文风有关的问题。

鲁迅提倡学习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反抗他所生活的黑暗时代服务的。他所运用的丰富的历史知识，也就成为他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和学用一致的问题。

鲁迅的理想，早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他的历史观，在他生前，对中国革命，对启发与指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即使从现在看来，他的历史观，也并没有过时，因为一方面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另一方面，某些历史现象，可能也一定会重视的，不要忘记前车是后车之师。这是一个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包括个人在内），少犯错误，卓有成效地工作的问题。

最后，我还要重复说一遍，当前我们正在学习六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的伟大事业，没有必要的历史知识，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懂得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党史，还要懂得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党史，要懂得六十年的党史，还要懂得旧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近代史，包括鲁迅的历史观在内。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六中全会文件的精神，指导当前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